

# 重估实用主义的真理观

莫法有，黄专途

(温州师范学院政经系，浙江·温州 325003)

摘要：在肯定我国 50 年代对实用主义批判必要性的同时，指出批判中所存在的全盘否定的片面性。文章剖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基础，认为实用主义强调以人的效用、利益为中心，把效用、价值原则引入真理观，反对消极机械的“摹写说”，赋予真理以新的活力，这正是实用主义的卓越贡献，它对于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，以及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意义。但它否定真理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，这是片面的、错误的。实用主义强调真理是一个探索、实践的过程，对于反对教条主义、思想僵化有一定合理因素，但它否定真理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性，是错误的。

关键词：重估；实用主义；真理观；价值；效用

中图分类号：B712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0-8691(2000)01-030-05

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的重要哲学流派之一。自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后，它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，成为旧中国一个主要的哲学流派。50 年代我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运动，将其斥之为“彻底的唯心主义”、“帝国主义哲学”、“反马克思主义”的标本……等等。实用主义从此声名狼藉，似乎一切坏思想、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是实用主义。应当肯定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这种批判是必要的。如果不对实用主义和其他反动思想进行批判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就难以确立其统治地位。但由于政治因素等影响，在批判中也出现了些偏差，后来又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认真总结，以致于造成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片面甚至歪曲的理解。80 年代初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，我国又一次形成“实用主义热”，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推崇实用主义，但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实用主义的内涵。他们大多没有研读过实用主义的著作，更没有对其作过理论上的疏理。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作一番重新考察，并作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实用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它的真理观。詹姆士说：“实用主义……也就是某种关于真理的理论。”<sup>[1]</sup>虽然实用主义各代表人物之间存在诸多观点上的分歧，但他们的真理观却是基本一致的。

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？它对真理是作怎样的规定和阐释呢？简言之，就是“真理有用论”、“知识工具主义”。詹姆士的一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“‘它是有用的，因为它是真的’；或者说‘它是真的，因为它是有用的’；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一样的。”<sup>[2]</sup>这一观点遭到了众多的指责和批评，人们纷纷指出，这是一种将真理等同于有用的

主观真理论，是“有奶便是娘”的资产阶级庸俗哲学，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理论。我们认为，这种批判虽有正确的一面，但有偏失、简单之弊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牵强附会。

为了准确理解实用主义真理观，有必要对其深层的世界观基础作一简要地阐述。

实用主义是一个同时兼具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特征的哲学流派。它一方面继承了休谟、孔德等人的经验论传统，认为认识是“经验内部的事情”，主张把哲学研究局限于经验范围之内，反对经验之外的形而上学争论。在实用主义者看来，传统哲学关于物质、上帝、绝对等概念的争论，纯属无谓之举，是毫无意义的。詹姆士说：“形而上学的辩论总好象与空气搏斗，没有一个实际的，可感觉的结果。”<sup>[3]</sup>因此，他主张避开传统哲学字面上的抽象争论，而趋向于事实、行动和实际经验。实用主义又具有人本主义的特征，它的代表人物说，把广义实用主义称作人本主义是非常合适的。认为世界离不开人，“象天国一样，世界也是自愿地听凭人类摆布的。其理全是由人产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”<sup>[4]</sup>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人的世界。因此，哲学只关心人，关心人所思维、所创造的一切有关问题。概而言之，实用主义的经验论立场，使得它把真理局限于经验范围之内，认为“一切真理都以有限的经验为根据”<sup>[5]</sup>。从人本主义基础出发，它认为真理是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的，是以对人有用、有实际效果，使人取得成功为根本标志的。詹姆士说：“人本主义认为，满足是区分真和伪的东西。”<sup>[6]</sup>

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与它的方法论密切联系的。皮尔士、詹姆士、杜威都主张，实用主义不是什么系统的哲学理论，它“首先是一种方法”。但它不赞成传统哲学事先设定原则的普遍的方法，它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、原则和范畴，而是去看“最后的事物、收获、效果和事实”。简言之，一切从实际效果出发，从功利出发，这就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。在实用主义者看来，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理论，只要能带来实际的效果，都可以认为是真的，具有真理的意义。可见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真理论。詹姆士说：“实用主义方法的意义不过是：真理必须有实际的效果。”<sup>[7]</sup>

实用主义从实际效果的方法论原则出发提出的新的真理观，与传统哲学真理观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。传统哲学把真理界定为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或思维与事物相一致，这一点实用主义并不反对。詹姆士说“真理意味着观念和实在的‘符合’，而虚假则意味着与‘实在’不符合。实用主义者和理智主义者都把这个定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”<sup>[8]</sup>然而对实在、“符合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却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看法迥然不同。实用主义所说的“实在”，是指经验所及的实在，是人的思维所“烹调过”、“消化过”、“装扮过”的实在，它包括人们的感觉流、信仰以及过去已有的真理等。至于人的思维之外的独立的“实在”，诸如绝对、上帝之类的原始之物，则不过是人们想象的极限，绝对是“哑的、虚幻的”，不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。实用主义所说的“符合”，主要不是指主观正确反映客观，而是指一部分观念（新观念）符合另一部分观念（旧真理），实际上是指符合人的某种需要。它反对理性主义的“摹写说”，认为观念不可能准确地摹拟观念的对象。从实际效果的原则出发，实用主义者对

真理“符合”特征作出了全新的理解。詹姆士说：“人本主义所谓‘符合’，乃是指这样地加以考虑，它使我们在理智上和实际上得到某种满意的效果。”<sup>[9]</sup>在观念符合实在的过程中，实用主义不会停止于简单的复制或摹写阶段，而会继续追问：真观念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？从经验上来说，它们的兑现价值究竟是什么呢？实用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：“真观念是我们所能类化，能使之生效，能确定，能核实的；而假的观念就不能。”<sup>[10]</sup>概而言之，真理并不只是简单地“摹写”，更为重要的在于，它是一个在个人实践中被证实和生效的过程。詹姆士把真理的“真”（正确性）和有用（价值性）比作一枚钱币的两面，看成是同一过程的两种后果。杜威把詹姆士上述思想发展为“真理即效用”的工具主义，认为各种学说、理论“和一切工具一样，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，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。”<sup>[11]</sup>他还说，工具本身是无所谓真或伪的，它只有有效或无效，恰当或不恰当，经济或浪费之别，唯“效用是衡量一个观念或假设的真理的尺度。”<sup>[12]</sup>由此可见，与传统哲学不同，实用主义最为关注的并不是事物的本体，而是事物的价值、效果和效用；把价值、效用作为判断知识、理论是否有意义，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。

应当肯定，实用主义把价值和效用原则引入真理观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，它赋予了真理以新的内涵和新的活力。事实上，真理总是有价值的，任何真理都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和价值性，无价值的真理是不存在的。离开了价值，真理不过是一种“绝对空洞的观念”，一种没有生命活力、抽象僵硬的东西。列宁也曾说过，如果几何学真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，也将被人们推翻。人类进步的历史活动是以追求真理和价值为主题的，人类也总是按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、改造世界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。因此，将价值和效用原则融入真理论，正是实用主义的卓越贡献。问题在于，它片面地强调了真理的价值而忽略了真理的客观性，抹杀了真理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，将价值性和客观性对立起来，以致最终陷入唯心主义。

以效用、价值为核心的实用主义真理观，对于改变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重名义轻效果、重义理轻功利的思维方式，引起人们对真理价值性的重视，也是有一定意义的。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，固然有“经世致用”的价值取向，文人学士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追求，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抱负，无不透露出功利主义的倾向。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方面则是注重于“正名”，强调“君子重义不重利”、“正其道不谋其利”等等。尤其是宋明新儒学（宋明理学），更是把功利和义理对立起来，离开事实空谈性命道德之学，毫无实际价值。这种“义利之辨”、“空言无实”的风尚，长期来禁锢着人们的思想，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。实用主义强调行动、效果和实际利益的价值取向，对于破除传统陈腐的思维习惯，开创一代新风，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20世纪初，由于中国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和特殊国情，“救亡图存”成为一代青年的奋斗目标。适逢此时，实用主义传入中国。它提倡的“不用看最先的概念、原则，而去看最后的事实和效果”这种不拘教条，注重实际的精神，深深地吸引了“五四”时期青年的注意

力。不仅胡适等人对实用主义坚信不疑，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它也没有完全否定。当时胡适与李大钊“问题与主义的论战”，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较量。李大钊严正地批驳了胡适以反对“空谈主义”为名，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立场，但承认胡适提出的少些“纸上空谈”，多“涉及实际问题”的观点给了他以很大启发，并表示“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。”<sup>[13]</sup>可以说，“五四”一代青年激进开放的新思想，无不直接间接地受到了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，尽管实用主义后来没有被中国人民所选择。

在当代中国，以效用、价值为中心的真理观，对于解放思想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意义。由于“左”的影响，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无谓争辩，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，极大地贻误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。直至十年动乱，“四人帮”把它推到极端，提出“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”，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稻”等口号，似乎红旗和卫星不可兼得，要社会主义就不能要物质利益。如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，不走出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误区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继续前进。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理论勇气，提出不搞抽象辩论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，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。事实上，早在6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著名的“猫论”，80年代又提出“生产力标准”，再到90年代初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提出“三个有利于”的标准，从而正式结束了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无谓争辩，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。从中我们看到，邓小平同志历来反对空谈，崇尚务实精神，主张把真理与效益、社会主义原则与物质利益相结合。

还值得指出的是，人们往往认为实用主义把宗教信仰也奉为真理，提高了上帝的地位。我们认为，这种看法是肤浅的，是对实用主义一种误解。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詹姆士的一段话：“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，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能令人满意地起作用，那么这个假设就是真理。”<sup>[14]</sup>类似的话语不只一处，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，实用主义所说的“上帝”，绝不是基督教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，它不过是一种假设，而且仅仅是因为它能带来某种满意的效果才作这样假设的。事实上，实用主义的经验论立场，已经否定了人格化上帝的存在，上帝的尊严早已烟消云散了。在实用主义者看来，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和上帝，乃是因为它们可以给人们带来“精神上休假日的好处”，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。很明显，只是在工具的意义，实用主义才承认上帝的“真”，它是在亵渎了宗教和上帝之后才去维护它们的。

在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问题上，实用主义否定绝对真理，主张相对真理论。实用主义认为，世界是“不稳定的”、“不可思议的”、“纯粹偶然的”，<sup>[15]</sup>所谓因果性、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秩序和法则，也没有完全可以依靠的、足以保证人们行动成功的绝对真理。真理总是相对的，相对于人，相对于人的变化着的经验而存在的。詹姆士说：“纯粹的客观真理是哪里也找不到的”，“一个看法是否成功是一个人估价的问题。”<sup>[16]</sup>因而，真理是随着环境和个人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。“我们今天只能按照能得到的真

理去生活，并且准备明天把它叫做是假的。”<sup>[17]</sup>在实用主义者看来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新事情，人们所遇到的也都是新问题，不能依靠以往的理论和经验。认为没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人们的行动有指导作用的普遍真理，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应付环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。面对新情况新问题，人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去探索，去实验，直至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。杜威提出著名的“思维五方法”，其本意就在于，强调通过假设和实验，从已知求未知的必要性，强调通过假设来探求解决新问题的途径，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意义。

实用主义反对传统理性主义静止的、绝对的“符合论”，反对把真理看作是“一种惰性的、静态的关系”。认为这种真理论把意识活动“消极化”、“静态化”，使真理成了一个惰性的体系，一种无生命的静止。一旦占有了真理，就止步不前了，思维的使被命就此完成了。这样的真理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实用主义与之相反，主张真理是“一个过程，亦即它对自己进行证实的过程……，它的有效性就是它的见效的活动的过程。”<sup>[18]</sup>在这里，实用主义把真理看作是一个证实和活动统一的动态过程，自然不无合理之处，这正是它比机械反映论高明之处。

综上观之，实用主义否定真理的客观性、绝对性，否定知识和真理的普遍有效性，这是片面的、错误的。但它强调真理的具体性、相对性，反对静止、僵化的真理观，把真理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要求人们不断探索实验，积极进取，无疑包含了合理的积极的因素。它对于反对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，反对教条主义和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，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伟大历史时期，在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，对此，我们没有现成的具体结论可以遵循，也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可以参照。因此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，面向和依据客观实际，进行努力探索和试验，勇于开拓创新，大胆更新观念；要对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不断进行概括和总结，上升为新的理论，使原有的真理性认识更加丰富和充实。

#### 注 释:

[1] [2] [14] [16] [17] 威廉·詹姆士：《实用主义》1943年英文版，第55、204、299、64、233页。

[3] [4] [7] [9] 詹姆士：《实用主义》1983年纽约英文版，第158、113163、184页。

[5] [6] [8] [10] 詹姆士：《实用主义》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，第133、253、101、103页。

[11] 杜威：《哲学的改造》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，第78页。

[12] 杜威：《哲学的改造》1920年英版，第85、129页。

[13] 参见李大钊：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、《李大钊文集》第229~230页。

[15] 杜威：《经验与自然》1958年英文版，第48页。

[18] 见《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，第157页。

[责任编辑：罗翊重]